

我自诩不属于时髦人士,于大多数新鲜事物的接受速度也较同龄人滞后一些。老友刷微博时,我还没有换智能手机。同事用支付宝和微信扫码支付时,我还在为资金的安全问题观望不前。七十年代末出生的我在做自我介绍时总是更愿意把自己简单说成是“70后”,仿佛觉得若能被误解为更老气一点的话,或许就能在“落伍”这件事上更容易被谅解一般。于是,有些事情在我这种“老古董”的观念里便自然形成了旧派与新潮的区别,比如喝茶属于守旧,喝咖啡则属于追新。

我并非排斥咖啡,对每日必饮一杯甚或几杯“黑汤”的潮人们也没有任何看不惯的意思。单就自己的肠胃而言,似更受用于品茗而已。饮茶后谈不上神清气爽,至少并无不适,而喝咖啡带来的麻烦却总比欢喜更甚。首先,饮用时间必须讲究,最好是在午餐前,如若超过午时,那么当夜的“数羊功课”定是不能豁免了。其

次,饮用后的几小时内最好尽量没有外出可能性,如此才不会面对下肚之后因肠胃蠕动效果加强而带来的尴尬。空腹饮用更是万万不可的,胃部发出的各种抗议之声总会令我心生懊恼和自责。正因有着诸多烦恼,使我追求潮人

咖啡外交

穆 茜

新饮的兴趣锐减,若非必要是绝不会自讨苦吃地去自寻烦恼的,我自觉是不可能喜欢喝咖啡的。

而谁曾想,偏偏某日起,我却莫名其妙地突然就绕不开喝咖啡这件新潮事了呢?

两个月前,我调换了一份新工作,按一般职场新人谨小慎微的态度默默观察良久,发现在新办公室里,喝咖啡这件事就如男同事约同抽烟、女同事小圈聊服饰包包的情况相仿,如若一直执拗地不肯入圈,似总有那么一日有要被边缘化的风险。抽烟

有害健康,我完全没有想要尝试的打算。朴素如我,也不善于畅谈时尚。因此,只能在被一群“品咖族”追问是否喜爱喝咖啡的时候作出了违心的回答。从此,开启了我的——“咖啡外交”。

“咖圈”自有其运行规律,一般以各人轮流做东为主。请客的人会在手机的各种外卖软件上搜寻公司附近的各色网红咖品逐一体验,以能赢得众人的夸赞为荣耀。认真如我,为了做好东势必是要刻苦钻研一番的。我开始学习不同产地赋予咖啡豆不同天然特性的基础知识,了解深烘与中焙对咖啡口感造成的微妙差异,获悉不同奶糖比例调制出各种品类咖啡的奥秘,尝试着为不同咖龄的人士选择适合其口味的各色咖品……要从小一介“菜鸟”成功跻身为合格的品咖人士,也是要付出相应努力的。

在外卖被送达后的十几分钟时间里,是咖友们聚在一起“嗨聊”的最开心时光,从本次咖啡的滋味聊起,至社会热点、公司新闻、养老保健、住房育儿等各种话题,无所不及。别小看这片刻的亲昵时光,最融洽的同事关系在这一刻里被塑造,最诚挚的同志友谊在这一刻里被建立。咖友们以其独特的方式构筑起牢不可破的、惺惺相惜的团队情义,就好比同窗之谊、战友之情。总之,能喝、会喝、愿意围绕咖啡畅聊的人,这个“组织”便不可你。

起初,喝咖啡后的惯常不适依旧会不时折磨我的肠胃,所幸的是经过月余左右不懈顽强的磨炼以后,我的身体竟已渐渐开

这段时间,上海滩在为“包子”“馒头”的名称讨论,甚至争论,有的认为上海人分不清包子和馒头,有的索性说上海话中没有包子一词。而《上海方言词典》也只有“馒头”词条,释义是“馒头和包子的统称,包括有馅的和无馅的。”这似乎说明上海话中没有“包子”。但我要强调的是,上海方言中另有“大包子”一词,词义是没有馅的“馒头”,几十年前,上海西南农村就是这样称呼的,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上海农村虽然小麦和水稻一直都有种植,但日用口粮历来以稻米为主。1950年代前,农村没有加工面粉的地方,农民也基本不吃面食,特别是不会将“馒头”当主食。若要吃顿面条,一是去镇上买“水面”(现制挂面,卷制面很晚才出现),二得自己动手用面团擀(方言称“剞面”),故方言中一直有这些词语,我家的面杖也一直保留到1980年代。对“馒头”(此处不分有馅无馅)一直敬而远之,且因都不会发酵、烫面,家里也不备蒸笼,自己不会去做。我还一直记得曾经的一件趣事。那是1950年代前期,老宅上曾先后驻扎过两队解放军,分散住在百姓家里,我家里还住过一个班。解放军吃饭是蹲在地上围成圈

始适应了咖啡因所带来的影响,各种不良感受不再作梗。即便是午后才灌下一杯拿铁,当夜也不会再辗转反侧地难以入眠了。没有了先前不爽的体感之后,其他美妙的身心感受便开始慢慢觉醒。咖啡的醇香和与生俱来的提神效果在为我打开无穷回味的味蕾享受的同时,还在我感到疲惫的时候为我注入鸡血般的工作激情,手捧一杯浓香扑鼻的咖啡与同事们胡天胡地“侃大山”的滋味,让我觉得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呢。

原本只是因为害怕被排挤才无奈入圈,没想到却因此增加了口福乐趣,



小立春风

摄影 许超森

同学阿哥上银幕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三毛流浪记》风靡一时。一次,我们完成小学包场组织师生观看。当银幕上出现一群“小瘪三”时,我们班级一个姓朱的女生突然对着银幕大叫:“阿哥,阿哥!”顿时引来哄堂大笑。朱女生却又哭又叫:“我没瞎讲,演迪个小瘪三的真是我阿哥!”但是,谁也不相信她的话。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在这部影片里,赵丹、孙道临、上官云珠等40多位大明星都是“跑龙套”,她的阿哥和我们一样是个小学生,怎么可能“额骨头碰到天花板”轮到他去拍电影呢? 咄!

到了星期天,朱女生硬是邀请我们几个同学到她家里做客。我们刚进门,她就将一个身材比我们略高一些的男孩子推到前面:“迪个就是阿拉阿哥!”又拿出几张《三毛流浪记》的剧照让我们验明正身。我们这才知道她真的没有骗人,赶紧向他们兄妹赔礼道歉。

可惜,她那有点文艺细胞的阿哥,后来并没有走上演艺之路。

一些小小的致敬

上世纪三十年代,阮玲玉风头最健,倾倒无数观众。吾生也晚,自然无缘领略阮玲玉的才情,但对这位“中国的嘉宝”极为心仪。2006年,我在晚报上获悉一条新闻:王开照相馆在地下仓库偶然发现几万张(包括阮玲玉、胡蝶等影星)的老照片;如今已是耄耋之年,虽然精神矍铄,怎奈旧梦重温,经过70多年的岁月淘洗,她只能语焉不详。然而,这虽是雪泥鸿爪,我却已感满足,因为这是我——一个影迷对前辈影星的深切怀念和虔诚敬意。

大包子·淡馒头

褚半农

的,也经常吃没有馅的“馒头”,孩子们经常会围着看,他们就会送给小孩吃。小孩拿到后,自然会拿给父母亲,这时“趣事”来了:大家吃不惯,也不爱吃,仅将“皮”撕下来先吃掉,其他部分再慢慢吃。解放军送的,父母亲们叫它“大包子”。翻检过去记录,十五岁时,我就曾记到“(食堂)工作人员就叫大家尽量多吃(水饺),还有的就吃大包子。”这是办起人民公社第二年(1959年)的事,农村大办食堂,集中供餐,吃饭还不要钱。那天食堂既做了水饺,又做了大包子。因大家没有经验,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结果,水饺做多了,而有的人吃的大包子,就是没有馅的“馒头”。

在我的资料库中,有吴语文学作品中“大包子”的两次记载,一是上海佚名小说《海上花魅影》中的,按序言所言,“考书中事迹,盖亦成于光绪年间者”,例句是“宋中叫跑堂的买了些葱油烧饼、鸡肉、大包子等物,各人吃过。”(第二回)虽然光凭这3个字,无法判定其有馅无馅,

但至少说明方言词“大包子”已经在社会上使用了。还有一例是创作《上海春秋》等小说的苏州籍作家包天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请李先生,站在从饭厅到斋舍的通道中,一个一个的搜检,搜出了一大堆。因为他们所穿的大褂子,袖口有一尺多宽,藏几个大包子在内中,还绰绰有余地呢。”(《钊影楼回忆录》)包天笑在光绪廿九年(1903年)后到山东青州教书时,看到学生暴殄天物,吃饭时偷偷把大包子带回宿舍后却任意糟蹋,丢在墙角,任它霉烂,他就派人搜检。例句中虽也没有写明“大包子”有馅无馅,但书中此前有个说明,“大包子”是指馍馍(作者将右边的“莫”写成“磨”字),而“馍馍”是没有馅的。包天笑小说里吴语用得很多,这里他也用上了。

1900年代以来,外来人口在上海城乡大量增加,带来了各地的小吃,也带来了各地的方言,“馒头”“包子”的不同理解、叫法长期并行,这必然会影响到“大包子”一词的存在,甚至会逐渐被淡出。但上海农村方言中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常用新词:淡馒头,这表明还是没有完全接受“包子”是有馅的“馒头”的外来说法。当然,年纪大的乡亲有时仍然还会叫“大包子”。

教爷爷识字

向琪钟

这个五一假期,做了最有趣的事:分别教5岁的小侄女和82岁的爷爷认字、写字。

小侄女学字,为了之后考试、升学,是面向未来的人生;而爷爷学字,是为填补人生的空缺。

在今年春节前,爷爷的日常就是各种劳作,田里、地里、山里、家里,劳动是他的人生信条;而今,身体大不如前,哪也去不了,做家务也吃力,整个人一下子就空下来了,所以,需要给爷爷找到人生新的乐趣。

幸运的是,大概3年前让爷爷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现在他会用微信和抖音,能与我视频,也算是“联网”了,可以获得外界的资讯。对老年人来说,“联网”其实是很重要的,要不然,慢慢就被时代遗忘了,衰老速度也会无形中加快。

教小侄女和爷爷认字截然不同。小侄女是一张聪明的白纸,任何笔墨都会很快在上面显影;而爷爷是一张厚重的报纸,上面记载着许许多多的过往,有人物、有故事、有地点。我教爷爷:这是北京天安门;我们住在余姚石步村西川岙……这些,爷爷都记不住,不能把每个字对号入座。但我一说“杨梅”,爷爷脸上就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每年夏至,爷爷都会去后山杨梅树上采摘杨梅,到集市上去换取口粮。

爷爷能认识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是一个宽阔的世界。

五一假期第二天下午,我前往位于苏州河畔的百年老校——华东政法大学参观游览。漫步在花园般的校园内,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百年建筑,熏陶着百年文化,接受着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最时尚的休闲方式了。

跨入万航渡路校门,仿佛来到了一座美丽的公园。主干道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将道路营造成林荫大道。幽静的校园,让我一下子远离了世俗喧嚣,回归到淳朴宁静的世界之中。拿出纸和笔,向校园深处漫步而去,开始领略、记录一百多年前圣约翰大学,今天的华东政法大学的百年风采。

路右侧的一幢楼让我停住了脚步。这栋叫“交谊楼”的两层楼建筑,是1919年圣约翰大学建校40周年时,该校同学会和校友为纪念校长卜舛济夫人黄素娥女士发起捐银而建。该楼曾经有过红色传奇故事。1949年5月下旬,陈毅选择了这幢楼为解放上海的第一宿营地。5月26日凌晨,陈老总进驻该楼,与魏文伯、舒同等领导在二楼小交谊厅打地铺休息,随行人员在大交谊厅休息。东方微白之时,陈毅步出交谊楼,行至大草坪,与值勤的该校学生党员交谈。上午,陈毅一行乘车到苏州河南岸视察,下午,转移至三井花园,开始接管上海工作。陈老总还在这里定下了三野“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一次了解这段历史,这是来华

政,意想不到的收获。

交谊楼对面就是陈毅与学生交谈的4号楼大草坪。1979年,华政第二次复校时,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学校党政工团领导决定以师生为先,先建图书馆及教学楼,并把现有的办公室全部让给教研室老师使用,在大草坪上搭建了临时帐篷作为办公室。帐篷内空间狭小,冬冷夏热,光线昏暗,但大家毫无怨言,以苦为乐。帐篷办公延续了数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帐篷精神”由此诞生。

漫步到苏州河畔,沿着900多米华政滨河步道前行,一侧是齐腰高的河堤,堤外是清澈的河水,波光粼粼,一侧是因地制宜,巧妙布局的“一带十景”景观小品,有思孟园、格致园、倚竹院、桃李园等。缓坡草坪,鲜花盛开,令人心旷神怡。苏州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U字形大湾,苏河将华政紧紧拥抱在其中。我突然觉得这像浦东陆家嘴地形的缩小版,华政就在尖尖的角上,成为绝美的一景。

过桥,重回南部校区,继续一路观景。此时,参观者及游客比我来时多了许多,听着他们的欢声笑语,看着他们拍摄着一幢幢百年建筑的情景,更看到有家长在给小孩讲着这里发生的故事,到处充满着温馨的气氛。

百年校园、百年建筑、百年古树、百年风华,一块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土地。带着满满的收获,漫步跨出校门。

「影迷」旧事

潘志豪

又喊:“统统写错了!”原来我居然把这些字的左右部分调换错了。怎么会犯这样的离奇错误?我苦思冥想,恍然大悟:一定是老在银幕后面看电影惹的祸!

那时,我家一墙之隔驻扎着一支留守部队。为了丰富官兵的业余生活,每个月有放映队来操场上拉起银幕,每次放映两部故事片。每逢此时,附近居民往往合家出动,操场里人满为患。我发现银幕前虽已无立足之地,而银幕后却是空无一人,于是另辟蹊径——到银幕后面看电影。开始还真有点别扭,因为银幕上人物的动作都是相反的,开枪是用左手,瞄准是用左眼,手表戴在右手……时间一长,也就渐渐习惯了,却没有意识到积久成弊,埋下了写字左右结构颠倒混淆的祸根。后来,我坚决不看幕后电影,胡乱“造”字的毛病也就霍然而愈了。

关于“反特片”

也是小学时,看了一部“反特片”(现在称为“谍战片”),谁知它毫无悬念,情节松散,乏善可陈。走出电影院时,我想到为了省下早餐费去买8分钱的儿童场票子,连续几天饿着肚子上课,心头顿时涌起一腔怨恨,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头(那时的小学生都把老师用剩的粉笔头藏在兜里玩耍),在影院门口那部蹩脚影片的海报下面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一点不好看,还我8分钱!”事后,我还洋洋得意地带同学来“参观”……

1983年,我在上海市职工影评比赛中获奖。当时,有人问我何时开始写影评,我张口就答:“在小学时就开始写了。”于是把当年的涂鸦糗事说了一遍,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夏天,我和小伙伴坐在弄堂口乘风凉,比拼谁看的“反特片”多(要求说出片名和演员姓名)。让我们有点“难为情”的是,印象最深、津津乐道的都是“女特务”,不仅能说出她们的芳名,还能准确叫出她们演的角色姓甚名谁,如王晓棠在《英雄虎胆》中饰演的阿兰、狄梵在《羊城暗哨》中饰演的八姑、张圆在《徐秋影案件》中饰演的邱涂凡……多年后反思此事,觉得:一是当年我们是情窦方开,天然就对女演员比较关注;二是那时演男性正面人物要求极多,以致演员束手束脚,相对而言,女性反面人物清规戒律较少,演员的创作空间不致太过逼仄,反倒显得生动可信,让人印象深刻了。